



扫码提取  
更多人物故事

【读一个人,读向更深邃的人生】

新作《三种爱》关注女作家的成长史

云游世界之后,这位温州籍作家不回避必须的面对

# 张翎:像树木一样长啊长啊

本报记者 张瑾华

这些年,张翎基本保持着“地球候鸟”的状态。

鼠年春节,张翎在温州,经历了温州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严格的时期;之后回到多伦多的家,自我隔离两周后,加拿大疫情发展严重,进入城市基本停摆的状态。

“两边的疫情我都赶上了,算起来我已经将近三个月没太出门了。”

好在张翎本来就是很宅的人。不过,张翎的宅,仅仅是一个静的阶段。在路上,则是她另一个动的阶段——她的“在路上”,不仅仅是加拿大与中国,多伦多和故乡温州之间,除了这“两点一线”,这只飞翔的鸟儿,还喜欢带着好奇心,去世界很多角落云游。

那些角落,那些地点,是能够勾起她灵魂深处片刻颤动的地方。

那些地点,曾经生活着她念念不忘的人,比如,勃朗宁夫人、艾米莉·迪金森、乔治·桑。

她的新书名为《三种爱》,在云游了一处处心目中存放已久的地点之后,她写出了自己的遇见。

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原著小说就是张翎的《余震》,那是一种灾难之后如何面对的表达。所以,这一次访谈,记者和她从新冠肺炎疫情聊起,这里同样有无法回避的面对。



张翎

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和美国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现定居于加拿大多伦多市。

代表作有电影剧本《只有芸知道》,小说《劳燕》《余震》《金山》等。根据其小说《余震》改编的电影《唐山大地震》,获得包括亚太影展最佳影片和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在内的多个奖项。

大疫后的心理创伤是多重的  
有国与国的紧张,有亲朋间的撕裂

钱江晚报:您的新书《三种爱》自然是以“爱”为中心的,您本人又从事过听力康复师的工作,疫情之后,很多人的心理需要康复,您有什么建议吗?

张翎:这次疫情范围之广,死亡的“黑爪”几乎爬遍了整张世界地图,不管平日以什么样的医疗科技成果倨傲的国家,全人类在这样的灾难面前依旧是猝不及防的。

看到每天死亡数字的攀升,每一个数字都是全家福照片上的一个窟窿,我忍不住想起约翰·多恩的“丧钟为谁而鸣”——“没有人能自全/没有人是孤岛……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减少……”。

这场大疫过后的心理创伤是多重的,有对逝去亲人的哀伤,有对无法和濒死亲人告别的巨大遗憾,有对可能由于自己的不慎而感染了别人的负罪感……这场疫情还造成了一个事先没想到的后果,那就是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意见上的严重分化。这种分化从大说是国际关系的紧张,从小了说造成了亲人朋友间的撕裂状态——这是一个很难迅速弥补的长期创伤。

而且,经过这场大疫的人并没有时间安静疗伤,我们都得立刻承受由于停摆造成的全球范围内经济萧条,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自走过这一关。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我们只能等候时间慢慢地填平沟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战胜时间,瘟疫也一样。

钱江晚报:关于爱的书写,读者可能会想到电影《只有芸知道》,这个剧本出自您之手,人到中年,您如何看待失去亲人,以及人生中其他的疼痛?

张翎:疼痛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治疗良方,唯一能够真正指望的是时间——时间会慢慢让我们学会遗忘。

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凤凰涅槃”“烈火金刚”的这些概念,不见得对所有的人管用,因为个体的承受能力有极大的差异。假如时间不能最终帮助我们抵达遗忘,我们可以尝试学习与疼痛共存。所有的心理干预都是希望能够缩短这个习惯的过程,假如环境是宽容有益的,人的反弹能力还是很强的。

光有创造力还不够  
她们还要有谋生的能力

钱江晚报:《三种爱》可以说是您在世界行走的一个产品,三个部分写于不同的时间,这些年,您一直在进行基于文化热情——比如对某一个作家的热情,而去探访他们的故居吗?

张翎:在我为了生计成为听力康复师、后来又成为作家之前,我的本科和硕士专业都是英美文学。我一直喜欢探讨在苛严的社会环境下女人是怎样成为作家的,又会和什么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

在十九世纪,一个女人想成为作家,光有创造力是不够的,她们需要有谋生的能力,还要有足够坚实的脸皮,经受得起男性占据话语权的文坛里的各种嘲笑和耻辱。

钱江晚报:我注意到您写这三位女作家时,都提到了她们自身的经济状况,我想到简·奥斯汀的小说,也都涉及到一个女性的经济问题,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济基础,这三位女作家还能成为后来的她

们吗?相对来说,其中诗人艾米莉·迪金森是依附于兄长生存的,这是否对她是一个巨大的困扰?

张翎:我所感兴趣的这几位女作家,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简·奥斯汀、勃朗宁夫人、乔治·桑,她们都有独立的收入,她们可以选择结婚,但假如选择婚姻,都是出于情投意合的爱情。

诗人艾米莉·狄金森则完全没有收入,连零花钱都得从哥哥口袋里讨,她是这些女作家中间的一个异数,她没有选择爱情的自由,甚至在生前没有发表过任何署名作品。

在同时代的欧洲男作家和艺术家中,常常会出现被贵妇人以各种形式“包养”“赞助”的状况,反倒是女作家在那个环境里依靠自身的才华、或者家族的遗产独立谋生。她们从男人身上汲取灵感和激情,但是她们并不依赖男人。她们也不依赖男人成名,事实上,她们在世的时候,大部分都比她们的男性伴侣更出名,比如勃朗宁夫人、乔治·桑、弗吉尼亚·伍尔夫。她们在今天这个时代看起来都属于超前的人,我对她们充满好奇。

钱江晚报:您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对女作家的关注的?看来还要边走边计划写一系列国外女作家,关于“她们的书”?这些您想写的女作家是否与您自身的女性立场比较一致?

张翎:对男性和女性的判断立场是基本一致的,并没有特别鲜明的“女权主义者”立场。我关注欧美女作家是因为同为女性,我可以省去跨性别的书写障碍。再者,关于那个时代的男性作家已经有了足够的书写,我更期待这少少的几个杰出女作家不被后世遗忘。

温州女人挺多元的  
无法用一句话或一个形象概括

钱江晚报:您的身份有多重:一个温州女人,曾经的学霸,曾经的听力康复师,作家。时至今日,您如何看待自己?

张翎:我不太“看待”自己,因为自己不好玩。只希望自己不要太过成熟,还能继续从世界汲取营养,用勃朗宁夫人的话来说,依旧希望“就像树木一样长啊长啊”。

钱江晚报:这两年,您的叙事中心依然在欧美和故乡之间来回游走,对今后的小说写作有什么规划?

张翎:现在到了我不再需要为稻粱谋的阶段,反而有些懒散,因为我深切感受到目前的状况下,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写作是个奢望,世界上绝对不缺一本不痛不痒的书,真让人疼痛的文字又早已被前人写完。

钱江晚报:电影《一个温州的女人》是根据您的小说《空巢》改编的,您如何看待今天的温州女人?她们和您《三种爱》中的三个传奇女人有相通之处吗?

张翎:温州女人也是挺多元的,我无法用一句话或一个形象概括她们。

大体上感觉,温州女人挺有韧性,挺能吃苦,在家中都承担得起重担——男人的一句好话能让她们移山填海。

当然,我是一个相对异类的温州女人,我丝毫没有经商头脑,除了写作,在一切其他方面都属于没有发育好的人,弱智而无能。我的存在似乎是专门为了衬托其他温州女人的强壮和坚韧的。